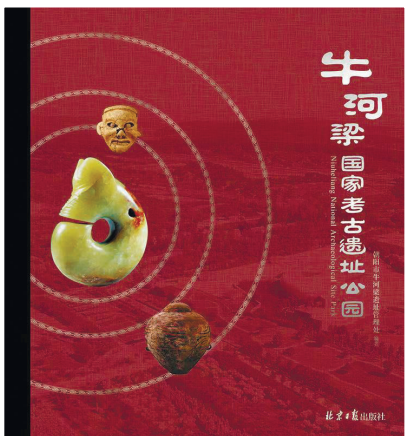


重磅  
品荐



《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管理处编著,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5 年 10 月出版。



# 曙光破晓处 解读牛河梁千年文明

王小柔

此外,在牛河梁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勾云形玉器,以天上的云为原型雕刻,中心镂空,形似弯钩,周边薄似刀刃,四角向外卷勾,通常出土于等级较高的中心大墓,多置于墓主人胸腹部或头部等人体关键部位。有学者认为勾云形玉器是巫师在祭天祈雨时用到的法器,也有人认为它是权力地位的象征。

这些玉器的工艺细节,更藏着红山先民的智慧。书中放大的玉器钻孔特写显示,红山工匠已掌握“两面对钻”技术,孔洞内壁光滑,误差极小;玉猪龙的表面抛光工艺更为精湛,历经五千年仿佛刚从工匠手中完成最后一道打磨。考古学家推测,制作这样一件玉器,需要经过选材、切割、雕琢、抛光等十余道工序,耗时数月甚至数年——这意味着“红山社会”已出现专门的制玉工匠群体,社会分工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玉器不再是简单的“奢侈品”,而是承载着精神信仰与社会秩序的“文明符号”;玉猪龙象征神权,玉凤代表祥瑞,勾云形玉器彰显王权,它们共同构建起红山文化的“礼治”体系,成为华夏文明“以玉为礼”的传统源头。

## 积石冢下的古国雏形

如果说女神庙是红山文化的“精神圣殿”,玉器是“文明信物”,那么散布在牛河梁山梁上的积石冢与祭坛,就是“红山社会”阶级分化与古国形态的“活化石”。书中“古国王陵”章节以航拍图开篇,58.95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和23.56平方公里的建设控制地带,51处遗址点散落其中,它们多建在岗丘顶部,以石块堆砌成圆形或方形冢体,周围竖置成排的彩陶筒形器,宛如“史前金字塔”,选址与布局体现规划意识。

这些积石冢的等级差异,在书的细节图中展露无遗。以第二地点2号冢为例,中心大墓墓坑长3.5米、宽2米,虽未出土文物,但残存的墓坑规模仍远超其他墓葬。而同一冢内的小型砌石墓,墓坑仅能容纳1人,无石板砌筑,随葬品仅有1件粗糙的石器。更具说服力的是第五地点的积石冢分层:下层墓葬多为简单的土坑墓,无玉器随葬;中层出现小型石棺墓,伴有少量玉器;上层则是规格极高的中心大墓,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头枕玉璧,胸佩勾云形玉器,腕戴玉镯,双手握玉鳖,其“王者风范”跃然眼前。

这种阶级分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红山社会”的政治实体紧密关联。苏秉琦在书的引言中写道:“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恰好印证了这一论断:女神庙作为最高祭祀中心,统一着先民们的精神信仰;祭坛的“天圆地方”形制(第二地点圆形祭坛、第五地点方形祭坛),体现着先民对宇宙秩序的认知与掌控;而积石冢的等级制度,则反映出“王权”已从部落联盟中脱颖而出,形成稳定的统治结构。

更令人惊叹的是红山文化的“延续性”。书中特别对比了牛河梁中轴线与紫禁城中轴线:前者以女神庙—猪首山为轴,后者以午门—太和殿—景山为轴,两者虽相隔五千年,却共享着“中轴对称、前朝后寝”的建筑理念;牛河梁祭坛的“天圆地方”形制,在后世北京天坛(圜丘)与地坛(方泽坛)中得到完美传承;而红山文化的“礼玉制度”,更是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从殷墟出土的玉戈,到汉代的金缕玉衣,再到清代的朝珠,玉器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等级与信仰的核心载体。这种文明基因的延续,正是牛河梁遗址最珍贵的价值所在: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史前文明孤岛”,而是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最早的“直根系”之一。

## 画册里的文明对话

《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收录丰富的考古成果,更在于以“视觉叙事”让沉睡五千年的文明“活”了过来。这本书的结构设计也颇具匠心。开篇的“宇宙年历”,以极具想象力的方式为牛河梁定位了时间坐标;主体部分按“遗址—文化—古国—文明”的逻辑层层递进,从具体的考古发现,到抽象的文化阐释,再到宏观的文明定位,脉络清晰,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中英文对照的形式让这部画册成为国际社会了解红山文化的重要窗口。

“也许这就是牛河梁,因为无解,所以魅惑无穷尽。”的确,牛河梁还有太多未解之谜:女神庙的七室结构是否对应着“北斗七星”?玉猪龙的原型究竟是猪还是龙?这些“无解”,恰恰是文明的魅力所在。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答案”,而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去探索、去追问。

牛河梁遗址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成为一座连接古今的“文明桥梁”。这座桥梁的一端,是五千年前红山先民们在山梁上垒起的祭坛、塑起的女神像、埋下的玉器;另一端,是今天的我们在博物馆里凝视女神面具、在书中解读玉猪龙、在课堂上讲述“古国时代”的故事。当孩子们在教材中读到“牛河梁遗址证明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历史”时,当国际学者通过这本《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了解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高度时,当牛河梁向世界展示华夏文明的起源时,我们便完成了一场跨越五千年的“文明对话”。

正如大凌河的水从红山时代流到今天,从未停歇,牛河梁的文明基因,也从五千年前延续至今,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部书,便是这场“文明传承”的载体,它以纸为媒,以图言语,将五千年的文明曙光,化作火种,让我们在回望中,更清晰地看见中华文明的来路,也更坚定地走向文明的未来。

# 物候为笺写就与自然的对话

王晨辉



当春风拂过江面,水獭将捕获的游鱼整齐排列在岸边,古人见了,便说这是“獭祭鱼”,像是生灵对天地的致敬;今人循着书页细察,会知晓这是水獭储存食物的本能,却也依然为那份原始的秩序感心动。这样的古今共鸣,藏在《万物有信:七十二物候里的中国时序》的每一页之间。作者李蔚以七十二物候为起点,写出自然科普的严谨与文化传统的温润,既解开了古人观天时、察地利的生存智慧,也为现代人打开了一扇重返自然的窗。

中国人对物候的感知,早在上古时期便已生根。《大戴礼记·夏小正》里“雁北乡”“梅杏桃李华”的记载,是先民刻在骨头上的自然日记;二十四节气划分黄道为二十四段,将地球公转的轨迹化作“春雨惊春清谷天”的韵律,这是农耕文明对宇宙规律最诗意的解读。而李蔚的巧思,在于从“节气”向“物候”的延伸,每个节气分三候,五日为一变,獭祭鱼、桐始华、半夏生、白露降,这些细碎的自然信号,恰是古人丈量时光的刻度。书中引《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释“处暑”：“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寥寥数字里,藏着古人对季节流转的精准把握,而紧随其后的“鹰乃祭鸟”,又为猛禽的捕猎行赋予了“义禽知报本”的人文想象,让自然现象与人类共情彼此映照。

这种双向解读的智慧,在书中俯拾皆是。雨水二候“雁北归”,李蔚既写大雁排成“人”字飞越千山的迁徙本能,也提《诗经》“鸿雁于飞,肃肃其羽”的乡愁意象;既解释候鸟体内“控制迁徙节奏的生物钟”,也忧心城市扩张中“鸟网与毒药对迁徙路线的截断”。当我们知道大雁每年要完成几千公里的苦旅,时速可达九十多公里,再读“似曾相识燕归来”,便多了几分对生灵韧性的敬畏;当了解到上海正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线”这一濒危物种最密集的通道上,便会明白保护城市湿地,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对自然契约的坚守。古人见雁北归,知春已至;今人观雁阵变化,察气候变迁。物候从未变,变的只是人类解读它的视角,而《万物有信:七十二物候里的中国时序》做的,正是架起一座连接古今的桥。

更动人的,是书中处处可见的“共生智慧”。古人观物候,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是顺应自然。处暑三候“禾乃登”,李蔚详解“五谷”的驯化史:稷为“百谷之长”,小米耐旱耐瘠,便成了黄河流域的主食;稻喜水湿,遂在江南织就“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图景;《黄帝内经》“五谷为养”的饮食哲学,本质是人类对作物习性的尊重。这种尊重,在现代语境下有了新的表达。

《万物有信:七十二物候里的中国时序》提到“洋草坪”的困境:欧洲冷季型草在国内“水土不服”,需频繁修剪却无吸尘降噪之效,而蒲公英、蛇莓等本土植物,既能适应气候,又能为昆虫提供栖息地。作者发起的“家门口的自然学校”,正是在践行这种智慧。让上海长宁区的孩子在小区里观察“腐草为萤”,让杨浦区的居民记录“寒蝉鸣”,不是要回到农耕时代,而是要在城市化中保留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当孩子知道“萤火虫的幼虫需在潮湿腐草中越冬”,便不会再随意踩踏草坪;当大人发现“蚯蚓出”是土壤透气的信号,便会懂得少用化学肥料。这种从“认知”到“行动”的转变,正是人与自然和谐起点。

李蔚的笔,既有科学家的严谨,也有诗人的温柔。写“腐草为萤”,她不只是说“萤火虫幼虫以腐草为食”,而是描绘“流光飞舞”的夏夜图景,让读者想起童年捉萤的时光;写“蛇雕”,她先讲古人“饮鸠止渴”的误解,再用现代科学为其“平反”,既纠正了认知偏差,也保留了文化典故的趣味。

书中的插图也很美,“桃始华”的粉白花瓣沾着晨露,“鹰始鸷”的羽翼掠过云层,“菊有黄华”的金蕊映着秋阳,这些细节让“物候”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可触可感的美好。当我们在书中看到辽宁岫岩出土的“万年狗尾草种子”仍能发芽,让杨浦区的居民记录“寒蝉鸣”,不是要回到农耕时代,而是要在城市化中保留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当孩子知道“萤火虫的幼虫需在潮湿腐草中越冬”,便不会再随意踩踏草坪;当大人发现“蚯蚓出”是土壤透气的信号,便会懂得少用化学肥料。这种从“认知”到“行动”的转变,正是人与自然和谐起点。

李蔚的笔,既有科学家的严谨,也有诗人的温柔。写“腐草为萤”,她不只是说“萤火虫幼虫以腐草为食”,而是描绘“流光飞舞”的夏夜图景,让读者想起童年捉萤的时光;写“蛇雕”,她先讲古人“饮鸠止渴”的误解,再用现代科学为其“平反”,既纠正了认知偏差,也保留了文化典故的趣味。

书中的插图也很美,“桃始华”的粉白花瓣沾着晨露,“鹰始鸷”的羽翼掠过云层,“菊有黄华”的金蕊映着秋阳,这些细节让“物候”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可触可感的美好。当我们在书中看到辽宁岫岩出土的“万年狗尾草种子”仍能发芽,让杨浦区的居民记录“寒蝉鸣”,不是要回到农耕时代,而是要在城市化中保留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当孩子知道“萤火虫的幼虫需在潮湿腐草中越冬”,便不会再随意踩踏草坪;当大人发现“蚯蚓出”是土壤透气的信号,便会懂得少用化学肥料。这种从“认知”到“行动”的转变,正是人与自然和谐起点。

书中最具远见的是作者对“全民物候行动”的呼吁。她提到美国国家物候网络靠志愿者数据监测气候变化,日本延续千年的樱花记录成为“气候变化的手资料”,而中国作为最早有物候记载的国家,却面临“观测点稀缺”的困境。于是,她发起公众记录物候的倡议,不是要求专业设备,只是让每个人在春分时节看看“玄鸟至”是否准时,在霜降时留意“草木黄落”的速度。这种“全民参与”的智慧,恰是古人“众人察天时”的现代延续。作者曾说“哪怕无法远行,仍可走出家门记录物候”,这句话点出了人与自然连接的本质:不必去远方寻找自然,身边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是天地的信使。当北京的读者记录“白露降”的气温,广州的读者分享“半夏生”的时间,这些零散的记录便会汇成一张“当代物候地图”,为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中国视角,也让每个人都成为“自然的守护者”。

七十二物候,是大自然写了千年的信。李蔚将这封信拆开,用科学的注解、文化的墨色、诗意的语言,重新誊写一遍,递到我们手中。当我们开始记录身边的“獭祭鱼”“雁北归”,便是在给自然写回信——这封信里,藏着人类对天地的敬畏,对生灵的善意,也藏着文明延续的密码。毕竟,人与自然的对话,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倾诉,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双向奔赴。